

玉门吾艾斯拱北的历史解读

李宗俊 董知珍

吾艾斯于唐初来华传教和病逝于路途的事迹为我国穆斯林世代传颂的佳话，其事迹传说具有一定可信度，至少有历史的影子在里面。在中国西北广大穆斯林中，对玉门吾艾斯及其拱北有着极大的认同感；但今天重要的不在于这种“历史记忆”完全真实，而在于长期以来其民族和群体成员集体赋予它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在于其民族溯源和群体认同中的特殊功能。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玉门惠回堡拱北应该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伊斯兰教 玉门 吾艾斯 拱北 唐代

作者李宗俊，1970 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董知珍，1974 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研究生。

吾艾斯墓位于今甘肃玉门市清泉乡以东 15 公里的新民堡，新民堡即解放前的惠回堡，此地因有传说中最早来华传播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先贤——吾艾斯长眠于此，后人在这修有其墓地，被称为吾艾斯拱北。又因它位于玉门市境内，又被称为玉门拱北或惠回堡拱北^①。

惠回堡地处故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每年都有东来西往的伊斯兰教信徒和游人驻足，前来敬谒、瞻仰这位为传教事业和中阿友谊献出生命的伊斯兰教先贤。近年来更有越来越多的来自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的穆斯林来到吾艾斯拱北，进行宗教活动，其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甘、新、青等地穆斯林交流的重要场所。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亦开始为此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1985 年，来自东乡的穆斯林出资重修了屡遭毁坏的墓室，后来玉门的穆斯林自筹资金修建了墓室的前殿，玉门市政府投资修建了接待室，从而使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有所改善。1990 年 8 月，玉门市人民政府把吾艾斯拱北列为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对惠回堡历史地理的考察

惠回堡，明时已被称为“惠回堡”或“回回堡”（因有回回人的墓地，且有穆斯林

^① 拱北是阿拉伯文 Gubba 的音译，原意为“尖顶圆屋建筑”。后来指中国伊斯兰教传教先贤、苏非派始传人、依禅首领，以及门宦的道祖、老人家、教务主持人等的陵墓。

居住于此故名)。但从宋元以来已有“回回”称号的事实,很可能这个名称的得名要早于明代。该地位处河西走廊的咽喉,向东紧靠丝绸之路的要径——黑山峡。

到了明代,惠回堡是西出嘉峪关的一个重要的驿站,是肃州至敦煌的十八马站之一。因明代的驿传制度为元代“站赤”制度的基本继承,所以我们怀疑惠回堡自元代,甚至更早以前已为一驿站。明时回回墓向西为关西七卫之一的赤斤蒙古卫的驻地,根据《明史》记载:“出嘉峪关西行二十里曰大草滩,又三十里曰黑山儿,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骗马城,并设墩台,置瞭卒。城西八十里即赤斤蒙古。”^①

至清代,这一地区已经不再是边疆战略要地。但它仍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和驿站,在清朝前期向新疆地区不断用兵的过程中,仍发挥了相应的作用。据记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赤金设营守备衙门,并设把总、守御千户所衙门,惠回堡设千总公署”,并于雍正五年(1727)“筑惠回堡城,周围二百丈,合一里二分零”;“开东门一道,城楼一座”,并派兵驻守,“惠回堡千总一员,马步兵丁一百名”。^②这样,惠回堡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和清政府用兵作战的需要,其修建的规模在逐渐扩大,各方面的设施在逐渐完善,直至清廷对新疆分裂势力大规模斗争的结束,清政府在玉门地区建设重点向靖逆厅(今玉门镇,后为玉门县治所)转移,惠回堡一带逐渐荒芜,乾隆五十年(1785)的地震使原有房屋建筑尽遭破坏,当年的城垣屋舍今已无存。

总之,惠回堡——骗马城一带,自汉代至清代前期始终是一个酒泉西出通往玉门、敦煌乃至西域的必经大道、关口要塞和兵防驿站,该地区的历史传说应该是相沿不断的;再查惠回堡一带地貌,该地处白杨河下游绿洲细土平原。白杨河出山后流经清泉乡、骗马城、惠回堡等地,没入戈壁,因此该地农耕条件优良,为农牧业生产兴旺的绿洲。加之,该地西去汉唐玉门县城今玉门市赤金镇 80 里,东去酒泉 120 里,均为游客行走约一二天的路程。因此,该地确为过往行人住宿停留的理想之地。而经过长途跋涉,困顿疲劳的阿拉伯传教士吾艾斯客宿、传教,最后逝世于此的事迹是可能的。

二、对伊斯兰教陆路东传和吾艾斯事迹考

关于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学界基本一致认为始于唐代。据说穆罕默德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他的弟子有人遵从了他的教喻,随即来到中国传教。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也有所谓“传道之年”。据说这一年就是公元 628 年,即唐太宗贞观二年。这一年,穆罕默德曾向九国派遣宣教使节。这里且不说这九国中有无中国,但就中国当时的地位与中阿往来频繁的史实,中国很可能也为其在此前后派遣使节的对象之一,至少他的弟子中有人中转他国来华传教是极为可能的;其次从阿拉伯此时的形势分析,因自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和部分信徒从麦加迁居麦地那,630 年又征服麦加,从此阿拉伯半岛在政治上、思想意识上开始走向统一。在此前后,伊斯兰教也就具备了

^① 《明史》卷 330《西域传》。

^② [清]《玉门县志·城垣》。

向外传播的强大的根据地,亦开始向世界性宗教发展;另外,再从唐以来,我国同中亚、波斯、阿拉伯之间的频繁交往来看,整个为唐一朝,中阿交往的记载屡不绝书。至于中阿之间的官方交往,始于唐永徽二年(651),《旧唐书》卷198《西戎传》载是年大食国“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此后阿拉伯人大量来华贸易经商和通使。

至于唐代阿拉伯人来到中国的路线,一为海路,这已为史书记载和今天的考古挖掘材料所证明。而且《惠超往五天竺传》就确载,当时的阿拉伯、波斯地区:“土地人性受(爱)与易,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狮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另一条即为丝绸之路。这一条,史书虽无明载,但因为当时在中国内地和西北有更多的阿拉伯人居住、经商。史载:“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①白居易诗亦有“紫髯深目两胡儿……安西路绝归不得”^②等句。由此充分说明当时由陆路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华,为阿拉伯人的主要途径。既然唐时西北陆路为阿拉伯人来华的主要途径之一,那么唐时伊斯兰教其中经陆路传入我国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正如李明伟先生所言:“笔者认为,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对西北伊斯兰教的传播起了主要作用。西北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由于地理的历史经济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③杨子伯著《中国回教的宗派》亦言:“回教传入中国是分水陆两路来的。水路从南海到广东,陆路从西北传入,首建礼拜寺在西安。”

关于伊斯兰教唐时传入我国,张星烺的《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转引《回回原来》一书有如下的记载:

大唐贞观二年三月十八日夜,天子梦一缠头,追逐妖怪,闯入宫门,醒后惊疑,不知何兆。次日召群臣问之。有圆梦官奏:“缠头系西域之回回。嘉峪关西,天方有一回王,道高德厚,国富兵强。怪物入宫,必有妖气。必得回回,庶乎可以消灭。”军师徐世 奏:“回回至诚不欺,结之以恩,则忠心悦服,永无他意。可遣使至西域见回王,求取真人,以镇压之。”天子依其言,遣大臣石名堂携旨往西域谒回王。回王接旨大喜,遣其国中高僧该思、吴歪斯、噶心三人,来华报聘。行至中途该思、吴歪斯二人不服水土病死。仅余噶心一人,跋涉山川,受尽辛苦,而至中国。天子优礼之。问礼经同异于朝堂,缠头告以西域有天降之经,名曰《辅尔噶尼》者,犹之中国之《五经》也,详论中西礼教不同。天子大悦,选唐兵三千,移至西域,换回兵三千,来至中国以伴缠头,此三千回众,生育无穷,即中国回教徒之祖先也。

^①《资治通鉴》卷15唐贞元三年七月。

^②白居易:《西凉伎》,《全唐诗》第13卷。

^③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

另外，保义堂刊《清真修道撮要》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回王马上修书一封，并宣大臣盖思、吴哀斯和罕戈斯三人为通使，以便偕同东土使臣石堂前往奉使唐朝。这三位老臣上殿一个个上知天文，下达地理，精悉真经。回王一见喜曰，弥三人出使唐朝肩负亲善邻邦，传播真经之重任，切勿有辱王命。三人领书谢恩出朝，当即整装起程，一路夜宿晓行。行至中途由于干涸的环境，突变的天气和食物的短缺，盖思、吴哀斯二人不服水土而相继死亡。只存罕戈斯一人，他跋涉山川和浩瀚的沙海，历经沿途的千辛万苦乃至中国京都长安。

再者，民国 8 年（1919）高级工程师林竞来西北勘查铁路线，途经星星峡，在《西北丛编》^①中记载盖斯拱北云：

此地有所谓回回墓者，在关帝庙东南。由官店入门于巉岩下，见三面竖木栏，内有小门，守者启钥导观，即见遗骸在地，上覆白布，无复数十重，均往来敬仰者所施舍也。壁间是阿拉伯字之联匾甚多，厅外有横额，书‘西方先贤盖无师之墓’。注云：‘师与挽觉无爰报唐皇之聘，物化于此。’”

上文所引，其中前两条在写作上移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写法，具有很多的神秘色彩，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但这些资料反映了唐帝国和大食帝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唐朝在安史之乱中曾借大食兵平定叛乱，材料所说的“更换三千回兵来中国”虽然不符事实，但有大食兵来华却在中国的史籍中能够找到的。而且据考：“《回回原来》一书，其最早的版本是在康熙末年，此书本身没有学术价值，但它在穆斯林群众中颇有影响，而且它也被 Deveria、Broomhall、Clarke、Masan 等先后将其译成英文或法文，而引起欧洲东方学家注意。”^②因而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次，以上所引史料与我国穆斯林中至今流传的最早来华传教的伊斯兰三贤事迹基本一致。这三贤中的一贤艾比·宛葛斯，唐初来华后在广州传教，并兴建了我国最早的清真寺——广州怀圣寺。歿后葬于广州城北流化桥畔。后来广州穆斯林把这个地方修建为一座陵园，即今解放北路兰圃北面的先贤古墓；另一贤盖斯，唐初来华传教，行至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时病逝。1945 年 3 月，哈密的伊斯兰教徒征得各大阿訇的同意，另选墓地，迁盖斯遗骨至哈密安葬并兴建陵园，即今哈密盖斯墓^③；再一贤即为吾艾斯，又称吴哀斯、吴哀思、外斯等，皆为不同的音译，病逝于今玉门惠回堡。

至于唐朝以后西北伊斯兰教的传播与穆斯林的分布传承情况。先是公元 10 世纪中叶，喇喇汗王朝的沙吐克·波格拉汗率 20 万帐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从此开始了西域突厥斯坦的伊斯兰化浪潮。此后不久，西夏自东向西渐次统治了整个河西地区，据拉施特《史集》第二卷记载：“唐兀惕（即西夏）地区所有那些军队和居民都是木速蛮”。木速蛮即回回教徒。这里显然有夸大之处，但另据《马可波罗游记》谈及途径西夏旧地时，说那里有伊斯兰教徒。说明迟至宋末元初河西就已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徒。

^① 林竞：《西北丛编》，中国神州国光社 1933 年版，第 222 页。

^② 李兴华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版，第 31 页。

^③ 关于盖斯事迹见戴良佐：《新疆盖斯拱北探讨》，《回族研究》，1996 年第 2 期。

蒙古帝国兴起后,在同中国境内的西夏和金政权进行军事作战的同时,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开始了对西域大规模西征。通过三次西征,中西交通大开,数以百万计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蒙古大军的裹挟下浩浩荡荡地沿着丝路古道来到中国,他们随着蒙古大军的行进被分散到全国各地,河西走廊一带就有大量的西来军士、工匠和商人等,他们居住在河西走廊,或戍守或屯田或进行商业贸易。据《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三中记载,到公元1260年“蒙古主徙甘、凉、肃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被徙者户四百三十六,口一千四百七十九”。由此可见,当时回回人在河西人口中已占很大比例,仅在肃州东关的两条街就“番回居大半”。随着10世纪波格拉汗在西域推行伊斯兰化和蒙元以来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军、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编户齐民,安西王阿难答所部15万蒙古士卒改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西北大规模传播开来。

明代,特别是永乐年间(1403~1424年),明代国力达到了全盛时期,明成祖加大了与西域地区的交往,取消了对西域诸政权朝贡的限制,根据各国与中原地区距离的远近,重新制定了“或比年,或间岁,或三岁,辄入贡”^①的政策。而且明政府对于西来之人在赋税、安全、住宿、贸易等方面给予优厚的待遇,这样,西域许多国家向明王朝朝贡,当然还有中亚的一些政权。这一时期进入河西走廊和内地最多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哈密人和吐鲁番人。大量的西域人来华,使河西走廊一带形成了以肃州、甘州和凉州为中心的大面积的回族的聚居地。在嘉峪关外,也有为数不少的“回回”居住在各地,而且这些“回回”多居住在交通便利的城镇。就是从明代起,惠回堡出现在了官修史书和地方志书中,初因该地“有回回三大冢”故名“回回墓”。^②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回回究竟有多少,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故无法详细考究。但就河西走廊而言,“回回”人的数量相当多并形成了一定的势力,明初回回攻占肃州城就说明了这一点。

到了清朝前期,回族遍及整个河西地区,他们和河西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居住和生产,回回街、回回村遍布河西城乡。直至清朝同治年间,饱受清政府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西北回民被迫起义,起义失败后河西地区的穆斯林惨遭屠杀和迁徙,从而改变了唐、宋、元、明以来这里所形成的大量回族聚居的状态。

从以上伊斯兰教陆路东传和河西地区自唐以来穆斯林经商、聚居未曾中断的史实,说明河西地区的穆斯林,对他们宗教的信仰和对他们本民族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历史记忆也是代代相传,不曾停绝,吾艾斯于唐初来华传教和病逝于路途的事迹也是他们世代传颂的佳话,其事迹传说与宛葛斯、盖斯事迹是一样的,由于记载资料有限是不十分具体的,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却是可信的,至少有历史的影子在里面。

三、对吾艾斯拱北的调查和解读

吾艾斯墓地,据陕西通志馆印《秦边纪略》载:“驢馬城俗称驢馬營,在肅州西

^① 《明史》卷332《西域传》。

^② [清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肅州条。

230 里，嘉峪关西 160 里，城东 40 里有惠回堡大冢”。还载：“骊马城在肃州西嘉峪关外，回回墓在其东，赤金城在其西”。《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四云：“回回墓墩在关西离城一百八十里”。这些记载回回墓的地理位置均与吾艾斯墓现址相符。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据《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元年九月丁丑，孝宗“命给肃州回回坟傍空地五亩，以葬凡哈密使臣之道死者”^①。这里的“肃州回回坟”，因其傍要葬从肃州以西来的哈密使臣，而玉门正处肃州西境，那其定指玉门惠回堡拱北。而且，从明初已称“肃州回回坟”，说明其历史和称谓应在明初以前。再者，将由哈密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使臣道死者都葬在这个被称“肃州回回坟”傍，又说明这个“回回坟”绝非一般人的坟墓，而应为在明初以前的西北穆斯林中已具很高威望者；而由此记载，说明记载玉门拱北的文字远早于清末记载盖斯拱北的宋伯鲁《西辕琐记》^②。

除此，有关吾艾斯墓历史上缺乏史料记载，特别是“文革”时期，拱北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一些重要的碑、匾失踪，使可供研究的资料更加奇缺。在仅存的部分明清以来一些显贵留下的墨迹中，具史料价值者不多。其中在吾艾斯拱北的大殿前分别立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李公谨题的石刻和书写于木料上内容大致相同的两块碑文，其文为：

今奉公西来，劝告汉回各族亲善至肃州。闻嘉峪关外惠回堡有先贤无爱斯之墓，闻讯后于阳历五月三日与马旅长子庄秦参谋长省三，来游查勘清晰，前有清真寺并回教墓地一处，现已平去矣。余询问当地住户回人马云者，言此地现在萧砚田手。即与萧交涉买回，奈伊分文不取，使伊甥张锡岐及马云之甥马致善二人将契约交来，约上系光绪八年经玉门县官买给程姓者，钱五千文整。余将约交肃州清真寺管，业嘱寺内立碑，道谢萧姓。先贤于我国有功，政府通令全国军民人等保护古迹，故立此碑，永志不忘，云耳！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

回部全权总代表

李公谨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立

另有一块木碑，其文曰：

中华民国四年仲春月立

先贤典盖师、挽师、挽尔师三位奉穆圣命，报明唐皇来华，盖师至猩猩峡歿归。

西域先贤无爱氏师之墓

东鲁兖部□ 淮安江苏□知县岁贡生王青选敬献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碑文的内容有一定的口碑性质，但说明吾艾斯与盖斯和宛噶斯一样，在中国穆斯林当中有很强烈的认同感。他在西北穆斯林中被视为传播伊斯兰教的先贤，而受到穆斯林的重视。而且据当地居民反映，直至解放前，吾艾斯墓仍由周克礼、马进仁等三户临夏回民按历代穆斯林的传统义务看守。至 1958 年，这

^① 《明孝宗实录》卷 18。

^② 转引自戴良佐：《新疆盖斯拱北探讨》，《回族研究》，1996 年第 2 期。

三户迁居新疆伊犁以后,1962年起由一位东乡族老人(女)义务看守。1970年夏季,曾由甘肃迁至新疆哈密“肃州坊”穆斯林和“陕西坊”穆斯林因出于虔诚的信仰派人来迁拱北,因意见不一未迁成。1980年起,一位名叫马星阁的老人,从临夏“出家”来此做“尔曼里”(祈祷),并义务看护拱北。随着他的到来,拱北逐渐得到广大穆斯林和当地政府的重视,拱北圣纪(穆罕默德生日纪念)活动一年比一年隆重。每年前来参加圣纪聚会的甘、青、新等省的穆斯林多达五、六百人。甘肃省政协委员马国泰教主、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委龙二师傅及临近省、市的阿訇、教长、教主、毛拉等宗教界知名人士先后前来拱北瞻仰、参加纪念活动并题词留念或赠送匾额旗幟。他们中,凡是采访任何一个前来参加圣纪活动的穆斯林,都会肯定的回答:“先贤(吾艾斯)是我们最早来华的传教者。”由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广大穆斯林中,对吾艾斯及其拱北有着极大的认同感,吾艾斯唐初来华传教的事迹是可信的。吾艾斯拱北作为西北穆斯林历史以来寄托宗教感情和缅怀先贤的圣地,应该是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的。

可以看出,在中国广大穆斯林中,对吾艾斯及其拱北有着极大的认同感,先贤(吾艾斯)最早来华传教的事迹是确信的。基于这些因素,联系到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历史研究强调的历史记忆的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吾艾斯及其拱北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这种理论是受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理论的启发,强调历史是各个不同时代的人在当时社会场景下的一种社会记忆,认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①这种包含着对本民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看法的“历史记忆”,实质上都是该民族和群体成员对自己民族和群体历史意识和共同意识的忠实反映。重要的不在于这种“历史记忆”可能会有多少真实性,而在于长期以来该民族和群体成员集体赋予它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在于其民族溯源和群体认同中的特殊功能。仅就吾艾斯这种为了宗教事业和文化传播而献身的精神,就已值得后人们为他立碑立传。正因此,吾艾斯作为我国穆斯林传说中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教者,其事迹与其拱北,早已成为历史上无数传教者和开拓者经丝绸之路,长途跋涉、劳苦艰辛来华传教的缩影。其拱北即为为我国穆斯林溯源本民族历史的文化象征和缅怀先贤遗志的纪念碑,为我国穆斯林群众当之无愧的宗教圣地。正因此,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作为研究中阿友谊、中外文化交流、中外交通史等方面重要的文物古迹和我国穆斯林的宗教圣地,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弘扬其文化资源的价值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 李建欣)

^① 参考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华涛:《喀喇汗王朝祖先传说的历史解读》,《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